

批判「武訓傳」

(第二集)

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1143

批判《武訓傳》(第二集)

編者：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
(阜成門外北轅士路)

1-40,000

一九五一年六月北京初版

定價(甲)2,700元

目錄

聯繫着武訓批判的自我檢討.....	郭沫若	一
爲什麼歌頌武訓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表現？.....	胡繩	四
從『武訓傳』的討論裏應該學到些什麼？.....	鄭 呂	二
讀孫瑜先生檢討後的一點意見.....	袁水拍	六
趙丹和武訓.....	桑 夫	三
好名詞掩蓋下的壞思想（評『武訓畫傳』及李士釗先生的檢討）.....	張再學	五
評『武訓畫傳』的創作作風.....	王朝聞	四
評『武訓畫傳』及李士釗先生的檢討.....	朱 丹	五
不應歪曲勞動人民的形象！（評『武訓畫傳』（李士釗編·孫之儗畫）的圖畫）.....	華君武	六
不許誣衊和偽造！（評『武訓』連環畫）.....	華君武	七
附 錄：		
我對『武訓傳』所犯錯誤的初步認識.....	孫 瑜	七
我初步認識了崇拜與宣揚武訓的錯誤.....	李士釗	七

聯繫着武訓批判的自我檢討

郭沫若

關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是一件很好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和實際問題具體地聯繫了起來，使很多讀者受到了很大的啓發。我自己也就是深受啓發的一個。

一直到今天爲止，凡是我所能接觸到的有關『武訓傳』的批評文字，我差不多都讀到了。我覺得謝興堯先生的『武訓其人其事』（『人民日報』五月三十日）寫得比較具體，特別是所附的『武訓活動時期以華北爲中心的國內大事表』及『武訓捐資興學收支表』，使人們對於武訓的真相可以一目了然。

武訓的存在，我是在抗戰時期的重慶，經過陶行知先生的表彰，才開始知道的。我一直不曾加以研究。但在一九四三年陶先生所主持的一個武訓紀念會上應邀講話，便也曾盲目地稱讚過他。一九四七年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我在弔詩裏面曾經提到武訓，而說陶先生比武訓更好。（原詩被收入『蝸螭集』，因手中無書，原語無從引出。）

我是犯了錯誤，主要的原因是不曾從本質上去看武訓，而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

會把他和太平天國與捻軍的革命運動聯繫起來看。今天武訓的本質被闡明了，武訓活動當時的農民革命的史實也昭示了出來，便十足證明武訓的落後、反動、甚至反革命了。對於這樣的人而加以稱頌，的確是犯了嚴重的錯誤。

我最不應該的是替『武訓畫傳』——可以說是電影『武訓傳』的姊妹，題了書名，還題了辭：

『在吮吸別人的血以養肥自己的舊社會裏面，武訓的出現是一個奇蹟。他以貧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討，歛金興學，捨己爲人，是很難得的。但那樣也解決不了問題。作爲奇蹟珍視是可以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裏面，不會再有這樣的奇蹟出現了。（八月十一日）』

那是去年八月十一日的事。『畫傳』的編者李士釗先生早就寫信來說：他在革大的學習結束了，他編的『畫傳』要在『光明日報』上連載（不知怎的後來並無此事），要我題個書名並寫點意見。我勉強地應付了，這實是我的錯誤。我當時是應該負起責任來，勸阻『武訓畫傳』的出版的，不僅沒有勸阻，反而盡了幫助宣揚的能事。

雖然我的題辭多少含有批判的成份，並惹得編者在他的自序中駁斥了我，但批判得十分不夠。而且在基本上還是肯定了武訓其人，而其基本的原因也就由於並不十分知道武訓其事。放高利貸來興學，所興的學又是要叫地主階級『子子孫孫坐八抬大轎』的，這有什麼值得『珍視』，有什麼『很難得』呢？武訓不僅沒有意思『解決問題』——使

老百姓翻身，他反而在增加問題，使問題更不容易解決——使老百姓更不容易翻身。這又算得什麼『奇蹟』呢？反革命者在封建社會裏要維持地主階級的統治，這本來是極其尋常的事。

滿清末年的武訓和蔣介石匪幫統治時期的吳稚暉，大體上是一個類型的人物，雖然他們所處的歷史階段不同，而知識水平也不能相比。但吳稚暉容易認識，而武訓比較不容易認識，原因是武訓和我們的時代相隔較遠，歷史的真相模糊了，而又不曾加以研究，那就更加容易為一些表面上的刻苦行為所蒙蔽了。因此，武訓的以身作則的奴化教育，事實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詛咒。

經過了這一次的討論，我是受了很大的啓發的。沒有經過仔細的研究隨便發言，沒有經過慎重的考慮隨便替人題辭題字，這種不負責任的小資產階級的老毛病，我已下定決心加以痛改。我誠懇地向讀過『武訓畫傳』的朋友們告罪。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

爲什麼歌頌武訓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表現？

胡 繩

錯誤呢？

電影『武訓傳』和許多歌頌武訓這個人和『武訓傳』這個電影的文章究竟有些什麼的小人物，捧到了神聖的殿壇上去。武訓這個人一生所作所爲究竟有什麼值得歌頌的呢？他是一個乞丐，向任何人磕頭求乞；他忍受各種屈辱和踐踏，並以受辱爲愉快；他幹各種非人的行爲（例如吃蛇蠍糞尿），把自己裝成小丑，爲了得到『賞錢』；他做牛馬做的工作，並以自己能代替牛馬的工作而洋洋得意。這一切難道不正是封建統治下的奴才道德的極端突出的表現麼？在階級剝削社會中，貧窮、受侮辱、受損害，並不就是可恥的。勞動人民一般地過着窮苦的、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生活。但因為貧窮而流爲沿門托鉢的乞丐，而且甘於爲乞丐，樂於爲乞丐，甘於被侮辱，樂於被損害，這才是最可恥的。武訓的可恥可卑，甚至還更甚於此，因為他給他的卑污的生活找出了一個『高尚』

的目的，這目的就是辦『義學』。他把行乞得來的錢通過地主紳士放高利貸，自己一個錢不花，『感動』了地主、紳士、官僚、以至『朝廷』，支持他，資助他，於是終於辦成了由地主紳士階級中的『有學問』的人所主持的『義學』，使得有一些兒童有『榮幸』受地主階級的教育。武訓用這樣的行為來表示：一個窮苦的人，無論怎樣受侮辱，受損害，無論過怎樣下賤的生活，都要忠心耿耿地保衛封建統治秩序，保衛封建統治者的道德思想；而能够這樣做，就能够得到統治階級的嘉獎。

這樣一個武訓，在當時受到地主紳士的贊助，受到專制皇朝的獎勵，後來又爲北洋軍閥和蔣介石所表揚，並爲一切封建主義者所推崇，那是不足爲奇的。但爲什麼至今還會有許多自以爲站在『進步』立場來認識武訓的人，十分傾倒地歌頌這個可恥可卑的乞丐和奴才呢？是什麼東西障礙他們看出武訓的實質呢？是什麼東西使他們甚至在企圖『批判』武訓的時候，還是捨不得不宣揚武訓的『可敬可愛』之處呢？如同『人民日報』所已經明白指出的，這主要是由於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在人們頭腦裏作怪的原故。

在這篇文章裏想要說明，爲什麼正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使得人們在觀察武訓這個角色的時候，陷入了如此嚴重的錯誤。

二

曾有一些歌頌武訓的文章的作者說，他們對武訓的估價是歷史主義的看法，而蔑視

武訓則是出發於反歷史主義的觀點。例如，認為武訓具有『自我犧牲爲人民服務的偉大精神』的程慶華說：『我們認識一個歷史人物必須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不能拿現在的人物與歷史上的人物比較，來衡量他們的輕重。』（『進步日報』四月四日）又如董渭川斷定『武訓這個名字應該說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並且說：『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偉大人物和偉大事跡，如果拿今天的革命成就來比較衡量，恐怕都有被否定的可能，但是只要在歷史上稱得起偉大的人和事，我們就應該從那個人代表的精神和那件事完成的過程，以及人和事在當時所發生的影響，特別是在今天還應該重視和發揚的某些優點，作肯定的介紹，似乎不應該用今天的尺度作否定的結論。』

我們得到否定和蔑視武訓的結論，究竟是不是因為我們採取了一種拿『現在的尺度』衡量古人的粗魯辦法呢？

馬克思主義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採取這種粗魯的、錯誤的辦法。如同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底絕對要求，就是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在分析任何一個歷史人物時，也不能違反這『絕對的要求』。在這『絕對的要求』中，表現着馬克思主義對待歷史的嚴格的科學態度。

難道對武訓的歌頌反而是從科學地分析歷史而達到的結論麼？事實上沒有一篇歌頌武訓的文章，具體地說到了武訓所處的時代。宣稱要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的程慶華甚至似乎不知道武訓是死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的一個人，他的文章中說：『武訓生長在數百年前的封建社會裏。』所有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脫離了具體的歷史背景而在空洞地歌頌着武訓這個人『所代表的精神』。他們並沒有，如同『人民日報』的社論所說的，『去研究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麼向着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麼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武訓生在鴉片戰爭前二年（一八三八年），死於中日戰爭後二年（一八九六年）。這個時期正是中國因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急速地降入半殖民地地位的時期。封建社會秩序受到強烈的震動，迅速地開始分解。農民大革命成爲迎接歷史新時代的先鋒。據說武訓在十九歲（一八五六年）開始有興學大志，那是在太平天國金田起義後六年，佔領南京爲首都後三年。太平天國雖然在一八六四年失敗了，但繼太平天國之後的『捻黨』和其他農民起義一直繼續到一八七〇年左右。農民大革命的浪潮催送封建秩序的死亡，滿清皇朝靠外國帝國主義的支持才能苟延殘喘。武訓辦成他的第一個『義學』是在一八八七年，中法戰爭後三年。其時，滿清皇朝害怕農民革命的再起更甚於害

怕外國的侵略。康有爲在一八八八年『上皇帝書』中描寫當時的情勢是：『強鄰四逼於外，奸民蓄亂於內』。他勸告皇帝實行『變法』，否則，他警告說：『金田之役，將復起矣』。就在一八八八年，山東巡撫召見武訓，滿清朝廷打破官僚主義的因循慣性，立即傳令嘉獎，『欽賜黃馬褂』，這和當時的情勢的關係是很顯然的。

根據當時的歷史情況來看，很明顯的，封建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是舊的、正在死亡着的事物，武訓正是屬於舊事物的一個渺小的奴才。堅決地起來和這種舊的事物進行鬥爭的是農民革命。從一八五〇年後綿延二十多年之久的農民革命的偉大力量阻止了資本主義強盜完全殖民地化中國的企圖，把滿清的黑暗的統治打得搖搖欲墜，並且使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得以在殘敗的封建制度之上開始生長出來。

在農民革命的大浪潮過去時，中國開始出現機器工廠、輪船局和電報、火車等。但是近代化的工業的發生過程是異常緩慢而困難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還沒有形成。僅僅在以康有爲爲代表的貴族知識分子身上，開始透露了資本主義傾向的改良主義政治要求。康梁的『百日維新』是在武訓死後二年發生的。

這些貴族知識分子的改良主義者們仇視農民革命運動，這是他們的反動性的一面，這種反動性使他們後來墮落爲保皇主義。但是在維新運動時期，他們的改良主義還有其積極性的一面。他們違反頑固的封建勢力的意志而企圖按資產階級方向進行政治改革，因此封建王朝報答他們的不是黃馬褂而是死刑。

由此可見，就具體的歷史情況來看，武訓不但和當時的農民革命主義背道而馳，而且也不能和當時的資產階級性的改良主義相提並論。如果說武訓的思想，那不過是極端地忠於封建主義的奴才主義，至死不悟的保皇主義。

但武訓的歌頌者提出了兩個脫離了具體歷史環境和違反歷史事實的論點：

第一個論點：武訓是立意爲人民的『文化翻身』而『奮鬥』的，所以值得歌頌。做這樣的歌頌，實際上就是說，完全不觸動舊的社會經濟形態，舊的政治，只要在人民中進行文化教育——甚至也完全不管教育的內容，就可以改變人民的被壓迫的地位。

第二個論點：如果說，武訓並沒有實現解放人民的目的，那麼他的失敗也正如當時的農民革命的失敗一樣。武訓的歷史地位高過農民革命。至少和當時的農民革命是同樣的。

這種認爲離開政治鬥爭，人民可以在文化上『翻身』的看法，這種爲提高武訓而抹煞和侮蔑農民革命的看法，是從什麼觀點而來的呢？——這不是別的，就是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有許多人正是從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出發而欣賞和讚美武訓這個封建主義的奴才。

三

電影『武訓傳』提出了用辦義學來『解放』人民的思想。電影中用形象告訴人，窮

人因爲不識字所以才吃虧，地主因爲有筆在手就可以生殺予奪，所以武訓的努力是造福於人民的，至少是『動機』十分善良的。董渭川的文章鮮明地說：『勞動人民要想翻身，必須透過教育。』電影中借參加武裝鬥爭的周大說：『好，武七！你來文的，我來武的，咱們一文一武，讓那些狗官惡霸知道，咱們老百姓不是好欺負的！』

這種『一文一武』的看法，得到不少評論者的附和。說得最明白的是發表於『光明日報』上的長之的文章。他說：『武訓興學之革命的意義，是和太平軍那樣的革命的意義，有某種相同處——都爲了勞苦大眾翻身，不過一重在革命武裝，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長之的文章又說，電影中是『批判了武訓興學的革命意義之限制性，讓人覺得只有二者合起來，再加上正確的領導，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國今天這樣子』。這就是說，『中國今天這樣子』就是武訓加太平軍加『正確的領導』。這位作者如此熱心地表揚武訓，顯然正是爲了想說明，甚至在造成『中國今天這樣子』的革命中，武訓式的人也是和武裝起義的羣衆有同樣的『革命意義』的。

首先，把這種『革命』企圖擺在武訓身上，是一種捏造。根據關於武訓的真實的材料，武訓並沒有夢想過由辦學來改變封建統治秩序而『解放』人民，他其實是爲了尊重封建統治秩序，所以才立志辦義學。在封建關係下被壓迫的農民也不會發生這種夢想。

因爲農民或者由於其長期被壓迫而形成的保守性不敢進行反抗，把一切歸於『命運』，或者由於忍受不住被壓迫生活『揭竿而起』，造反。從殘酷的封建統治秩序中不能產生這種靠文化教育就能解放人民的幻想。這種幻想是武訓的歌頌者加到武訓身上去的，是用一種『自由』資產階級的調子唱出來的幻想。

其次，武訓歌頌者所加於武訓身上的這種幻想甚至還落後於當時的具有資產階級傾向的貴族知識分子。如我們前面所說，康有爲的改良主義運動究竟還是要去觸動封建統治秩序，那怕是很少的觸動。康有爲也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張，他要求廢科舉，開學校；他要求學校中教授『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等等（見一八九五年上皇帝第三書）。當然，康有爲並沒有主張根本推翻封建教育。他只是主張按資產階級的方向在教育上進行一種改良，這和他在政治上的改良主張是相適應的。如果實行這種改良，封建統治秩序就不能不發生某種程度的變動，這是當時的封建統治勢力所不能接受的。但是武訓怎樣做的呢？他只是按照地主官僚的方向而辦義學，在他的義學中，封建教育的內容分毫也沒有改變。所以在當時康有爲的思想還是屬於資產階級革命萌芽時期的思想的範疇，儘管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在這個貴族知識分子身上只能表現爲十分軟弱的改良主義。而借用武訓來表現的這種文化教育普及論却完全是屬於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範疇的。

不應該抽象地看『普及文化教育』。在革命鬥爭時期，宣傳進步的文化思想，以提

高羣衆覺悟，推動政治鬥爭，是有價值的。但要使進步的文化教育真正在人民大眾中普及，當反動政權沒有推翻時，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是不應該去設想的。如果不進行推翻反動政權的革命鬥爭，而去『普及文化教育』，那就只能是普及反動的文化教育。人民的『文化翻身』，必然追隨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翻身而來，絕不能是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的變革的前提。在革命鬥爭時期，普及反動的文化教育，其意義就是阻止羣衆的覺悟，抵抗革命鬥爭，所以是反動的，是向反動階級的投降。

電影『武訓傳』和有些武訓的歌頌者不也是指出了武訓的失敗麼？但問題並不是，用普及文化教育來解放人民究竟能否實現。因為現在，事實上，中國舊時代中的一切教育救國論都已經宣告破產，中國人民的解放已經通過人民大革命而勝利，到這時候，如果還不知道這一點，那真是白晝做夢了。問題是在，這種願望本來就是毫無價值的，就是在人民的革命時期起來縛人民的手腳的作用的，就是反動的。

列寧在一九一二年所寫的『兩種烏托邦』[●]一文中指出俄國當時有一種資產階級的反動幻想：

『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協的辦法，不必得罪任何人，不必撤消普里

● 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七〇六至七一頁。『烏托邦是個沒有地方，是一種空想，虛構和幻想』，列寧文章中這樣解釋。以後所引的列寧的話均見這篇論文。

什克維奇輩，不必用徹底的殘酷的階級鬥爭，而就能在俄國，在俄國政治自由方面，在勞動民衆地位方面，達到某些嚴重的改良。這是妄想自由俄國能與普里什克維奇輩和平共處的烏托邦。』

列寧又憤怒地批評說：

『這種烏托邦的壞處，顯然不僅由於它是烏托邦，而且由於它敗壞羣衆底民主意識。相信這種烏托邦的羣衆永遠也不會爭得自由，這樣的羣衆不配享受自由，這樣的羣衆完全應該遭受普里什克維奇輩的戲弄。』

武訓這個人，不過是一個封建主義的奴才，當然說不上有什麼資產階級的烏托邦思想，但許多武訓的歌頌者正是用這種資產階級的觀點來打扮了武訓，把他送到了舞台上。

我們同樣應該說，由歌頌武訓而表現出來的資產階級觀點之所以是有害的，還不僅因爲這是一種幻想，而且因爲它敗壞羣衆的鬥爭意識，它告訴羣衆，爲了求得勞動羣衆的地位的根本改變，可以和反動統治勢力和平妥協，甚至還應該向反動勢力卑躬屈膝，採取這種辦法是不應該受唾棄的，反而是應該受尊敬的。

四

電影的編導者又告訴我們，中國農民對統治者的多次鬥爭——『無論武訓的「文」

或周大的「武」——沒有馬列主義思想武裝的工人階級政黨的正確領導，是無法奪得政權，獲得永久的勝利的。」●同樣的看法也見於上引的長之的文章中。據這位作者看來，『武訓』和太平軍同樣有其『限制性』。

這些看法都是借革命農民的名義來抬高武訓，同時也是用資產階級反動觀點來侮蔑革命的農民。按照這種看法，武訓是失敗了，但太平軍也是失敗了，武訓有的是幻想，但太平軍有的也是幻想，如果說武訓是錯誤的，那麼太平軍也同樣是錯誤的。

照武訓的歌頌者的描寫，武訓究竟做成了些什麼事呢？開了三個爲地主階級教授三綱五常的學校。但在歷史上，太平軍做了些什麼事呢？太平軍和當時的其他農民戰爭固然最後都是失敗了，但是在中國近代歷史的轉變關鍵中起了重大的積極作用，如我們在前面所已經指出的。人們究竟根據什麼來說這二者是同等程度的幻想呢？

戴白韜的文章說：『像周大那樣的結夥上山的痛殺地主惡霸，既不能解救苦難的人民，但像武訓一心以爲讀了書就不會被人欺騙侮辱也是幻想』。●這說法也是錯誤的，我們不應該只用『幻想』二字來輕描淡寫地『批評』武訓，同時也不能承認電影中的描寫，把偉大的農民革命說成僅僅是『上山痛殺地主惡霸』，並且以爲它和武訓是同類的

● 孫瑜著電影小說：『武訓傳』，一七〇頁。
● 引自孫瑜著『武訓傳』的附錄。